

- Democracy: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3):237–68.
- Ho, Man-yee, Fanny M. Cheung and Shu-fai Cheung. 2010. “The Rol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Optimism in Promoting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8(5):658–63.
- Knight, John, Lina Song and Ramani Gunatilaka. 2009.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4):635–49.
- Liao, Pei-shan, Yang-chih Fu and Chin-chun Yi. 2005. “Perceived Quality of Life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An Intra-culture Compariso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6(1):43–67.
- Mishler, William and Richard Rose. 2001.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1):30–62.
- Treiman, Donald J. 2009. *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Doing Social Research to Test Idea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Veenhoven, Ruut. 2008.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Michael Eid and Randy J. Larsen (eds), *The Sci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pp. 44–61.
- Wan, Po-san, Kenneth W. K. Law and Timothy K. Y. Wong. 2008. “Subjective Well-being, 1997–2006,” in Sai-wing Leung, Po-san Wan and Siu-lun Wong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6*.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209–44.
- Wang, Zhengxu. 2005.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1):155–71.
- Wang, Zhengxu. 2010. “Citizens’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Six Asian-Pacific Giant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1):51–75.
- Wrosch, Carsten and Michael F. Scheier. 2003. “Person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Importance of Optimism and Goal Adjustment,”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12(Suppl. 1):59–72.

4 革命前夕

台灣與香港民眾對中國效應與政府評價的比較

林宗弘

前言

2014年，台港兩地分別爆發了與「中國效應」有關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震撼國際，也重塑了兩岸關係與中港關係。筆者有幸參與台港兩地學者合作的「中國效應調查」，並分析了這兩場「革命」前夕的調查數據，提供對中國效應影響台港民眾對政府表現評價的經驗證據。

在台灣，國家認同與兩岸經貿政策早已是塑造選舉結果的重要政治議題，許多研究都曾探討台灣民眾身分認同、政治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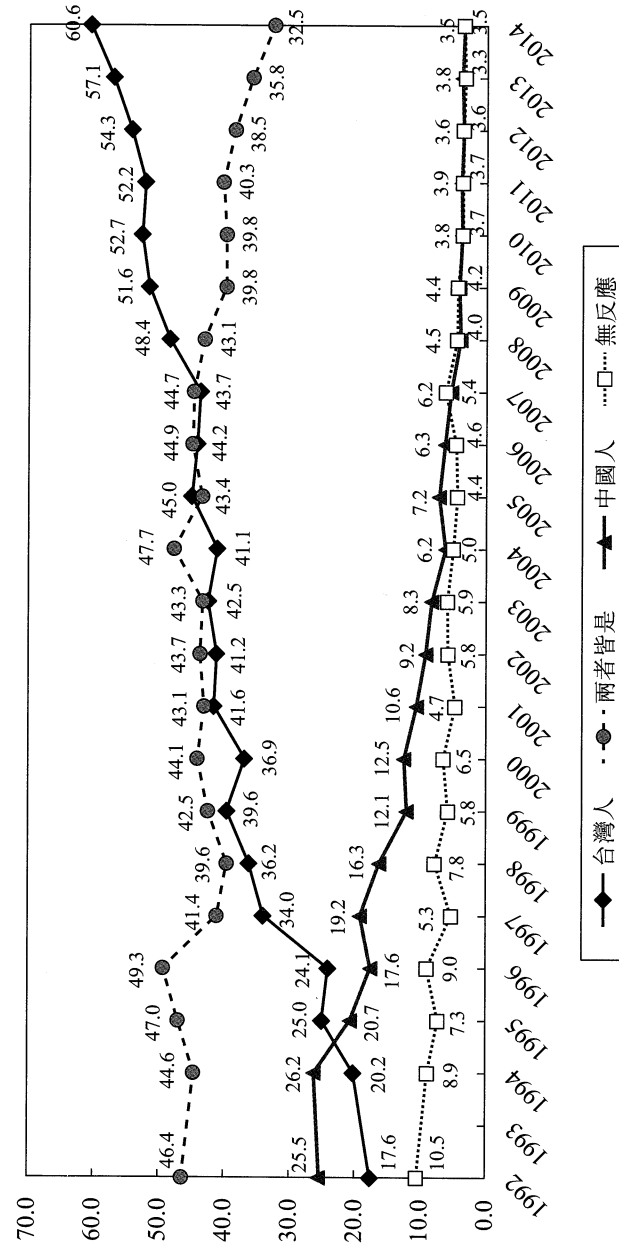
* 本文修訂自「中國效應與政府評價：台灣與香港民眾的比較」一文，曾發表於2013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台北，政治大學，11月30日），其中部分研究成果以討論紀錄形式發表於「中國效應：台灣與香港民眾政治滿意度的比較」，《文化研究》，第18期（2014年），頁178–87。作者感謝張茂桂、蕭新煌、陳志柔、吳介民、趙永佳、尹寶珊、鄭宏泰、葉仲茵、黃子為、陳允中、姚人多、李丁讚等多位學者的指教，以及研究助理楊芷瑜的協助，文中錯誤概由作者負責。

度與投票行為之間的關聯（劉義周，1994；陳義彥，1996；陳陸輝，2000；盛杏媛，2002；吳乃德，2005；游清鑫、蕭怡靖，2007；耿曙、劉嘉薇、陳陸輝，2009）。2008年馬英九執政以來，國民黨政府於2010年簽訂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並引起貿易利益分配的貧富差距與階級政治效應（林宗弘、胡克威，2011）。2012年，由於台商旺旺集團逐步併購所謂的三中媒體集團——中視與中天有線電視頻道、中國時報集團與中嘉有線電視系統，以及其抹黑抗爭者的行為，引起台灣學生與學者對媒體抹紅的疑慮與「反媒體壟斷」抗爭。此後，原定在2013年簽訂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服務業部門裏中小企業與勞工團體的不滿，並且造成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與「兩岸協議」監督聯盟等組織的成立和持續抗爭。2014年3月18日，由於一小群抗爭者意外衝入立法院議場而展開長達24天的國會佔領運動。

在這場所謂「太陽花運動」爆發前夕，許多民意調查顯示，中國效應與民眾對政府施政的評價確有相關。一方面，在兩岸經濟整合的政策影響下，2008年起，台灣民眾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開始超過台灣人與中國人「兩者皆是」的比例，並且不斷攀升，各種調查機構所做出的統計結果相當一致（圖1）；另一方面，在許多政治經濟事件的負面影響下，對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屢創新低（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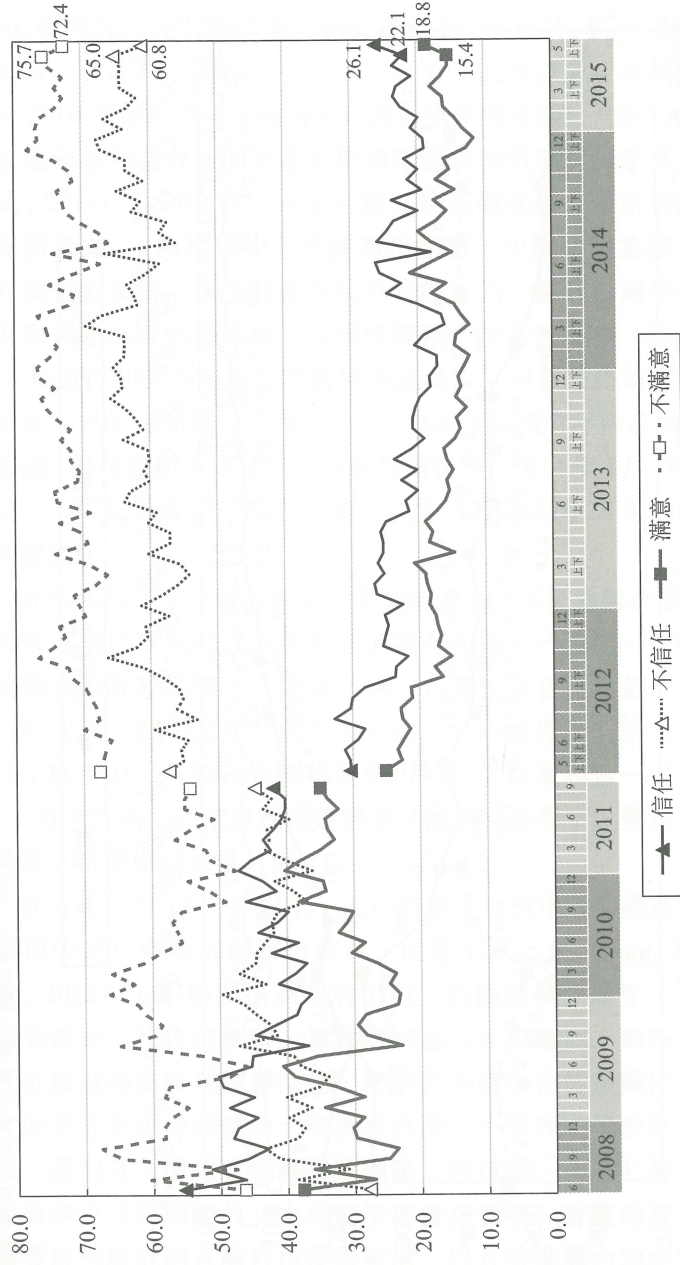
在香港，自1997年以來，由於特區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政權（簡稱中共）不斷推遲政治改革，民意不滿已久（Sing, 2004；馬嶽，2012），本屆梁振英政府仍由「烏籠選舉」產生，合法性備受質疑。特首選舉時，親建制候選人互揭瘡疤、梁振英當選特首後被揭露房屋違建問題、民眾對中聯辦在背後操控港區人大選票甚至綁樁的疑慮、特區政府擬在小學和中學強制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導致家長與學生團體上街抗爭、廉政公署領導在內的多位「內閣閣員」出現違法或貪污情事、香港無線電視牌照發放所造成的言論自由受限疑慮，以及香港與內地經濟整

圖1：台灣民眾身分認同趨勢的變化，1992-2014（%）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15）。

圖 2：馬英九的信任度與滿意度趨勢，2008-2015 (%)



注：2011年9月前資料引自遠見民調，該網站在總統大選期間宣布轉型與終止相關民調。
資料來源：遠見民調（2008-2011）；台灣指標民調（2015）。

合政策——例如自由行旅客行為舉止與香港民眾之間的衝突、「雙非」（父母雙方皆非香港居民）新生兒擠佔醫療資源，甚至出現中國內地食品安全問題導致嬰幼兒奶粉被內地觀光客倒賣而缺貨等事件（楊春，2012），引爆了香港身分認同爭論。隨着佔領中環運動與北京及特區政府的對峙態勢升高，2014年9月26日晚上，少數學生重奪「公民廣場」的行動意外引爆雨傘運動，而香港警方的暴力與催淚彈攻勢進一步激化運動，群眾佔領金鐘、旺角與銅鑼灣等地長達79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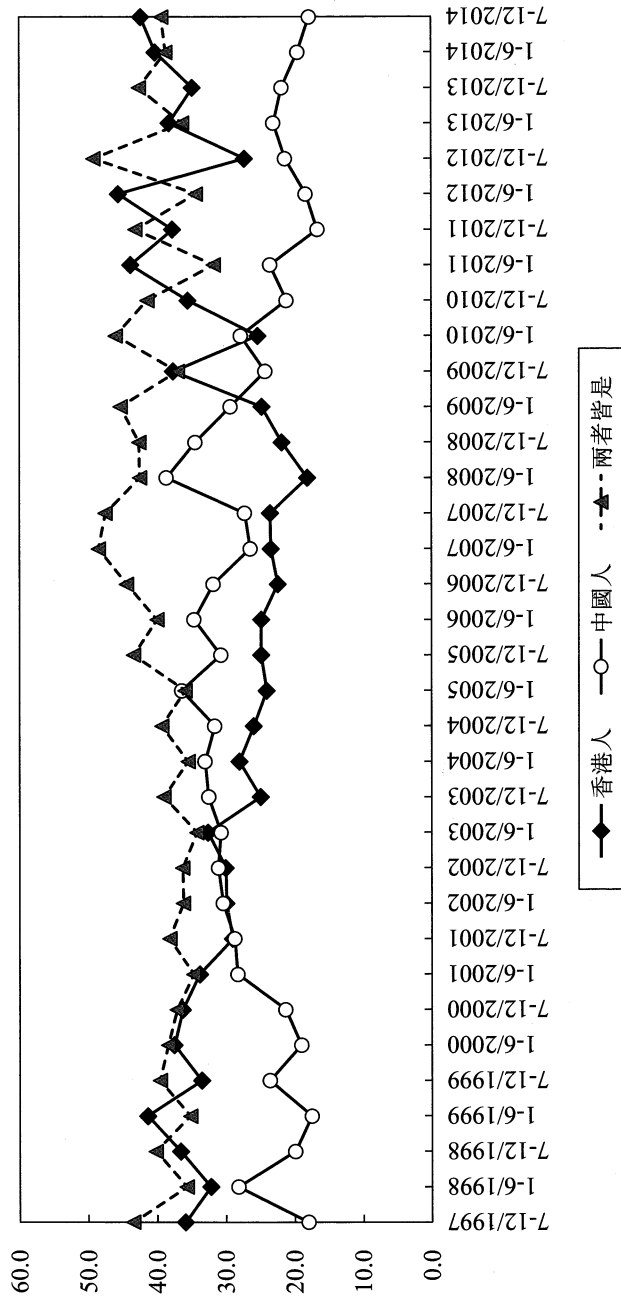
從相關數據的趨勢來看，在雨傘運動爆發前夕，中國效應已影響了香港民眾對政府的評價。一方面，從2010年開始，香港人的自我認同由香港人與中國人「兩者皆是」佔較高比例，轉為以「香港人」較多（圖3）；另一方面，梁振英執政以來，民眾滿意度始終遠低於過去20多年來其他香港領導人同期的數據（圖4），顯示中國效應對香港民眾看待特區政府表現的影響。

在中國崛起的種種政治經濟效應下，近期台港民眾對身分的自我認知偏離「中國人」而轉向本土認同，而且台港兩個相對「親中」政府的民意評價同時遭受嚴重衝擊，我們該如何分析這種特殊的中國效應所帶來的合法性危機？

在過去的文獻中，對中國效應影響台灣民眾政治態度的機制有兩個主要的假設，第一個假設是族群政治假說，認為台灣的族群或省籍意識，透過家庭社會化塑造國家認同，並且影響民眾對朝野政黨的政治滿意度與投票行為（吳乃德，1999）；第二個假設是貿易的階級利益分配假說，認為兩岸經貿往來擴大，將會透過貿易利益分配，導致階級政治的興起，進而改變選民的投票行為（林宗弘、胡克威，2011）。經驗證據也大致支持這兩個假說。總之，台灣文獻中對中國效應已有一些初步的理論建構與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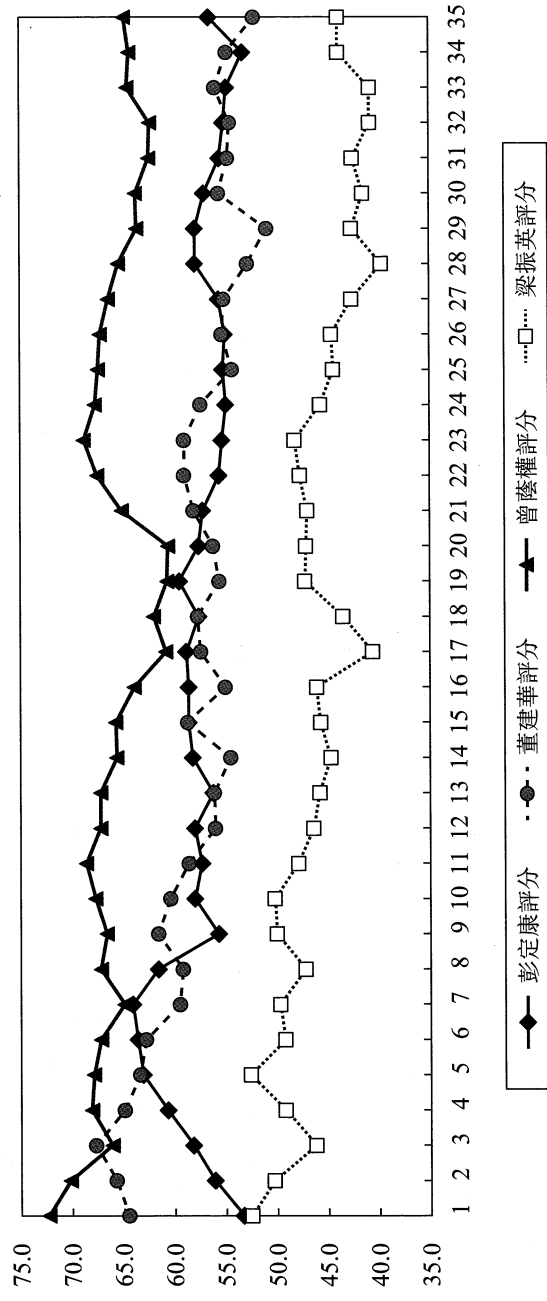
台灣文獻中出現兩個重大的「中國效應」，是否適合分析香港的政治現實？就族群政治或國族認同衝突而言，文獻中有

圖 3：香港民眾身分認同趨勢的變化，1997-2014 (%)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網站 (2014)。

圖 4：最近四任香港行政領導人任期首 35 個月的民意支持度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網站 (2015)。

關台灣與香港的比較非常少見，例如王家英、尹寶珊（2008）的統計分析發現，香港民眾的身分認同與對香港內地關係的意見，以及對自由民主政治態度關係非常密切，可惜並未進一步與台灣進行比較。然而，最近香港民眾身分認同的衝突浮現，似乎在政治滿意度中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與台灣 1949 年大移民所造成的省籍政治差異相比，香港的內地移民佔人口比例更高，對身分認同的影響應更分化，而香港與內地的經濟整合程度，遠勝於內地與台灣的經濟整合程度，是否因此加深了香港民眾的身分認同衝突與階級矛盾？中國效應是否透過身分認同與經濟利益這兩個因素，左右台港兩地民眾對政府領導人與政治體制的支持程度？台灣的民主轉型，與香港受限的「鳥籠民主」相比，是否影響民眾的政治滿意度？

透過 2013 年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共同合作設計，並同步進行的「中國效應調查」，本文試圖回答上述的問題。結果發現，香港民眾的身分認同，與本土出生或內地移民經驗有強烈的關聯，塑造出類似台灣省籍或族群政治對政府評價的影響；然而，在香港與內地貿易利益的分配政治方面，卻呈現與台灣不太相同的趨勢，對中國相關產業經濟依賴者，以及依賴香港政府福利政策的中下階級，更擁護親中政府的政治現狀，這些中國效應的相同與差異之處，值得進一步研究。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在台灣，對政黨支持或政治滿意度的研究，通常沿着兩條文獻軸線進行，第一群文獻關注台灣民主轉型以來所引發的身分認同與族群政治問題。最近隨着兩岸經貿往來擴大，與不同產業的利益團體衝突浮上檯面，出現了探討開放經濟政治（open economy politics）的相關文獻。這兩類文獻中所暗示的政治社會學一般理論，不僅在台灣社會有一定的作用，或許也有助理解香港民眾在中國效應之下對港府的政治評價。

族群政治與身分認同命題

無論其政治哲學是否正當，或其歷史根源是否虛構，族群身分、語言或文化對民族主義的影響力，是民族主義文獻中常見的議題（Smith, 1987, 2008）。在民族主義與族群政治文獻中，社會理論與政治哲學的主張經常糾纏不清，筆者跟隨嘗試將其分為以下兩類：族群起源論與族群民族主義（Smith, 1987），以及國族建構論與公民民族主義（Hobsbawm, 1992; Anderson, 2006 [1983]; Gellner, 2006）。從歷史的視野來看，與民族主義創生過程類似，族群與公民這兩個概念，也是被國家與社會建構出來的群體範疇，然而，從短期的經驗研究來看，透過政治社會化的影響（Jennings, 2007），現代國家體系下的跨界移民經驗，往往在兩、三代人內仍明顯塑造其身分認同，而殖民主義、國家建構、膚色與宗教所造成的族群政治衝突，影響更為深遠（Wimmer, 2013）。

在台灣，身分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相關文獻相當常見，其中又以族群與世代對國家或身分認同的影響最顯著（張茂桂等，1993; 王甫昌，2003; Rigger, 2006; 陳志柔、于德林，2013; 林宗弘，2014），儘管學者多抱持建構論或公民民族主義的信念，也不乏對族群政治或國家認同建構過程的歷史分析與批判（王甫昌，2008），近 20 年的量化研究十分確定，台灣民眾的族群透過家庭社會化，對其國家或身分認同、政黨支持、政治信任，以及投票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吳乃德，1997, 1999, 2005, 2013）。從統計觀點來看，外省族群支持國民黨等泛藍陣營、接受中國認同或兩岸統一的機率，遠高於福佬族群，客家族群則介於兩者之間，幾乎已成定論（劉義周，1994; 陳義彥，1996; 陳陸輝，2000; 盛杏媛，2002; 陳義彥、陳陸輝，2003; 鄭夙芬，2009）。

在香港，出生地對民眾的身分認同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也有重大影響（王家英、尹寶珊，2008），本文希望進一步探討，台港兩地民眾的移民經驗與國家認同，是否會型塑其對政府的中國政策滿意度以及未來期望。也就是說，台灣民眾的族群身

分或香港民眾的出生地，可能影響其國家認同，國家認同又會塑造其對現任政府的評價，這是本文的第一組假設：族群政治與身分認同命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在個人層次上，族群身分與出生地不會改變，國家認同變項在短期內的變化，應被視為是不同族群身分與出生地的民眾，對中國效應與台港政府有關中國各項政策所引起的反應，換句話說，即使使用族群作為自變項，這個假設並不支持族群起源論，或因此違反建構論。

第一組假設，族群政治與身分認同命題：族群背景或出生地影響民眾的身分認同，並透過身分認同，影響其對中國政策（兩岸統一 / 「一國兩制」），以及對目前政府施政與民主政治的評價。

假設 1A：台灣民眾中，外省族群更傾向自認為是中國人，較支持兩岸統一，對現任親中政府與民主政治的評價偏高。反之，本省族群更傾向自認為是台灣人，較不支持兩岸統一，對現任親中政府與民主政治的評價偏低。

假設 1B：香港民眾中，出生於中國內地者更傾向自認為是中國人，較支持「一國兩制」，對現任親中政府與民主政治的評價偏高。反之，香港出生者更傾向自認為是香港人，較不支持「一國兩制」，對現任親中政府與民主政治的評價偏低。

經濟利益與階級分配命題

除了族群政治因素外，開放經濟政治學近年的相關文獻指出，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民主轉型、貿易或移民的開放，將會造成本地不同階級的損益（Moore, 1966; Rogowski, 1989; Hiscox, 2002;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6; Atkinson, 2008），從而影響選民對政府的支持度（Lake, 2009）。根據比較利益法則，在較先進的經濟體向發展中經濟體開放貿易或移民時，當

地富餘的生產要素（主要是資本與技術的擁有者）將會獲益，而稀缺的生產要素（主要是勞動力與土地的擁有者）將會受害，這個所得分配效果，又與右派或左派政黨的政治分歧重疊。在美國與歐洲，貿易開放與政黨的階級立場及選民的偏好緊密相關，台灣與香港雖然階級形成較弱，應不會成為例外。

台灣已有文獻發現，產業外移到中國內地，提升了台灣非技術工人的失業率與貧窮率（落入貧窮線之下的家庭比例），台灣對內地貿易依賴度與台灣失業率高度相關（0.95）；此外，對內地投資佔台灣對外投資比例，與台灣失業率及貧窮率也高度相關（林宗弘, 2013:299）。也就是說，兩岸經貿往來的規模與項目，往往會造成某些特定產業與階級受益或受害，因此，兩岸貿易協議的簽署，每次都引發重大利益衝突與政治爭議。根據中央研究院 2010 年 6 月第一次社會意向調查資料的分析，學者發現台灣民眾對兩岸簽署自由貿易協議有巨大歧見，除了族群身分、國家認同與其他政策所造成的影響外，中下階級認為，兩岸經貿關係擴大將使貧富差距惡化，因而反對兩岸開放自由貿易，資方與管理階層則認為，兩岸經貿關係擴大將促進經濟成長，因此支持兩岸開放自由貿易；其次，認為兩岸經貿有益於台灣經濟者（多數是資方與新中產階級），傾向相信國民黨能夠代表他們的階級利益；認為兩岸經貿將導致貧富差距擴大者（主要是工農與中下階級），傾向相信民進黨才能代表他們的階級利益（林宗弘、胡克威, 2011）。

與台灣相比，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貿易往來，以及人員流動的相對影響更巨大，相關研究也曾討論不同因素，例如對中國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蕭新煌、尹寶珊, 2014）、對政治改革的看法（馬嶽, 2012），以及對貧富差距的認知（王卓祺、尹寶珊, 2012; 黃子為、葉國豪, 2013），對政府民望支持度的影響，我們可以合理地懷疑——與台灣的情況類似，在香港，中下階級民眾受經貿開放衝擊較大，因此較反對香港與內地經濟整合。

然而，在歷史因緣際會的影響下，台灣與香港的階級結構與族群關係仍有不同，可能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在台灣，早期研究發現，外省族群有教育成就的優勢，因此更可能晉身為中產階級，而本省族群則更可能成為地主或資本家（Yang, 2007），但近年族群之間的階級差異，幾乎已消失殆盡（林宗弘, 2009），使得族群與階級對政治行為的影響相對獨立（胡克威、林宗弘、黃善國, 2010），結果，台灣在兩岸經貿上的階級利益衝突，其政治分歧的結構趨近於其他工業國家（林宗弘、胡克威, 2011）。

在香港，多數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經常落入社會底層，他們可能更依賴過去的「老鄉」關係，或者是在內地的社會網絡與資源，以及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屋與綜援等福利，而且人口主要集中在某些低技術服務行業，例如旅遊、餐飲、運輸倉儲與批發零售行業，其就業情況與收入高低，與內地來港自由行遊客數量息息相關。反之，本土中產階級則集中在金融、房地產、法律、醫療與教育服務等高技術服務行業，其產業利益雖然一部分來自內地集團企業，但少不了英資與本土港資的支持，反而有較強的香港認同與專業自主性（呂大樂、王志鏗, 2003），此外，亦有學者指出後物質主義與世代差異的影響（Sing, 2010），我們必須考慮這種本土脈絡所造成的政治效應。

第二組假設，經濟利益與階級分配命題：階級位置以及與中國內地相關的經濟利益，影響民眾對內地開放貿易的評價，從而影響其對現任政府與民主政治的評價。

假設 2A：台灣民眾中，中下階級從兩岸經貿中的經濟獲益偏低，對兩岸經貿往來造成貧富懸殊的議題更敏感，更傾向貿易保護主義，且較不支持兩岸統一，因此對現任親中政府與民主制度的政治評價偏低。

假設 2B：香港民眾中，中下階級從香港與內地經貿中的經濟獲益偏低，對兩地經貿往來造成貧富懸殊的議題更敏感，更傾向貿易保護主義，且較不支持「一國兩制」

而偏向民主改革，因此對現任親中政府與民主制度的政治評價偏低。

假設 2C：與一般理論對立的香港新移民假設：由於香港的中下階級與中國內地出生的新移民身分重疊，也更依賴內地遊客自由行與親中政府的服務，使得低技術工人階級更支持現任的親中政府與「一國兩制」，資方或中產階級則更不支持親中政府與「一國兩制」。

政治轉型命題

最後，台灣與香港比較的另一個重大差異在於政治體制。台灣在 1990 年代初期就進入民主轉型期，2000 年政黨輪替後逐步朝民主鞏固邁進，但香港自 1997 年以來，民主轉型就受到中共阻礙。依據比較政治與民主轉型的相關文獻，民主化將會影響選民對身分認同與經濟利益的界定，其間複雜的關係則有爭議。

文獻中有關民主轉型與國家認同的觀點大致有兩種：從公民民族主義的理想來看，公民權利與主權範圍一致，民主轉型與國家認同的建構應並行不悖，亦即民主化長期有助建構一致的國家認同。然而，近來一些爭議性的文獻認為，民主轉型中的弱勢政權，往往無法調解不同的民族主義訴求與族群衝突——也就是無法壓制少數族群追求獨立，而政治菁英為了競爭國家權力，可能會對族群衝突火上加油，甚至可能出現「從選舉到暴力」的民主崩潰（Snyder, 2000; Mansfield and Snyder, 2005）。

上述觀點通常是將民主當成原因，而國家認同或民族主義衝突當成結果，然而認同分裂，也可能是社會運動與民主化的動機（Tilly, 2007）。台灣的相關研究則指出，民主轉型初期的動力，可能來自族群身分的衝突，以認同政治為主（王甫昌, 2003），族群衝突在短期內可能導致民眾不滿，對民主政治的評價下降（瞿海源等, 2005），但民主鞏固之後，認同政

治的動力也可能逐漸下降，並出現利益政治的傾向（胡克威等，2010），長期來說對民主價值的評價逐漸上升（王靖興、孫天龍，2005；張佑宗，2011）。

民主化著名學者 Linz 和 Stepan（1996）認為，國家主權界定了政治社群與民主的基本範圍，沒主權就沒民主，他甚至以香港為例，認為缺乏主權的城市自治體，可能無法建立民主制度。然而，儘管具爭議性，在主權具不對稱隸屬關係的政治體制下，仍可能找到民主化的案例，例如北愛爾蘭、魁北克與加泰隆尼亞，有學者對此進行了比較，指出香港政制在自主性與權力不對稱之間的兩難（Henders, 2010）。在這種兩難困境中，當民主化前景不明朗時，香港內地關係與認同政治可能持續引起政治衝突，不同身分認同的香港民眾，對民主政治的評價或滿意度有重大差異，同時也造成民眾對政府施政評價的低落。此外，政治現代化理論也認為，在民主轉型完成之前，中產階級可能更反對威權統治（Lipset, 1981），因此更支持反對勢力，這也使得香港的中產階級更反對現任的親中政府。

第三組假設，政治轉型命題：政治體制是否已完成民主轉型，影響民眾身分認同本土化的程度與其對民主的評價。

假設 3A：台灣在政治轉型之後，族群政治衝突退潮，民眾的身分認同變得更為本土化，對政治經濟利益分配的認知較為清晰，因此對民主政治的評價較高。

假設 3B：香港在尚未完成政治轉型之際，民眾面對政治不確定性，身分認同出現嚴重衝突，因此對民主政治的評價較低，其中又以中產階級較反對威權體制。

數據來源與個案描述

我們的研究資料，來自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合作，由張茂桂教授與趙永佳教授主持、在台港兩地同時進行的「中國效應調查」2013 年度資料，

在合作過程中，台港兩地學者有意識地設計類似的問題，這份數據給我們寶貴且獨特的機會，比較台港兩地中國效應對政府評價所造成的效果。

在台港兩地的家戶抽樣電話調查中，台灣訪問成功的樣本共計 1,243 人（母體約為 2,270 萬人），其中女性佔 48.4%，外省族群為 14.0%，非勞動人口 31.9%，除了平均年齡約 46.9 歲略為偏高之外，其他統計性質都與總體數據類似。香港訪問成功的樣本共計 1,006 人（母體約為 715 萬人），其中女性 53.1%，內地出生者為 30.4%，非勞動人口佔 45.1% 似乎略為偏高，而平均年齡為 44.8 歲，與官方數據相當趨近。香港樣本與台灣樣本的敘述統計請參見表 1 與表 2。

主要依變項

在本文中，我們選擇了台灣與香港兩地類似的依變項，來測量民眾對政治的評價。本文所使用的三個主要依變項如下。首先，是受訪者支持哪一種兩岸關係或香港內地體制，在台灣方面，本文使用的是：「如果中國大陸在經濟政治各方面的發展都和台灣差不多，兩岸就應該統一」，評分是很同意 = 4、同意 = 3、不同意 = 2、很不同意 = 1 四級；在香港方面，我們使用的是：「您是否支持『一國兩制』？」由於樣本中並沒有回答很不支持者，因此評分主要是很支持 = 4、支持 = 3、不支持 = 2 這三級。其次，本文用來測量台港民眾對政府評價的問題是：「整體而言，請問您對台灣（香港）政府的評價好不好？」答項分為很好、好、不好與很不好四級。最後一個問題是：「整體而言，您對台灣（香港）民主政治的評價好不好？」答項也是分為很好、好、不好與很不好四級。

針對上述三個問題，我們都將答項轉換為正面回答很同意、很支持或很好為 4，同意、支持或好為 3，不同意、不支持或不好為 2，很不同意、很不支持或很不好為 1，也就是轉換成等距的次序變項。

表 1：主要變項的敘述統計：香港

	樣本數	平均值	變異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往來中國內地次數	1006	2.899	2.714	0	7
月所得 (港幣對數)	775	10.089	0.715	7.131	10.869
自認香港人或中國人	1006	2.171	0.955	0	3
支持「一國兩制」	958	2.405	0.782	1	4
有助家庭經濟	910	3.279	0.960	1	5
貧富差距	926	3.921	1.089	1	5
對香港政府評價	856	2.259	0.737	1	4
對香港民主政治評價	887	2.297	0.720	1	4
非勞動人口	1006	0.451	0.498	0	1
非技術工人	1006	0.190	0.392	0	1
新中產階級	1006	0.250	0.433	0	1
自營業者	1006	0.061	0.239	0	1
資本家或雇主	1006	0.049	0.215	0	1
香港出生	1006	0.696	0.460	0	1
內地出生	1006	0.304	0.460	0	1
年齡	997	44.816	17.754	11	75
教育年限	1003	12.479	3.614	0	18
女性	1006	0.531	0.499	0	1
已婚	1006	0.645	0.479	0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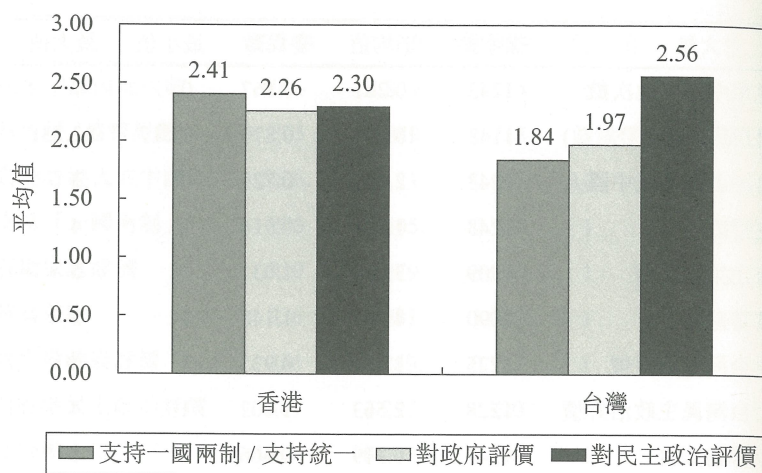
從敘述統計的平均值來看，台灣與香港在這三個依變項上有一些顯著的差異。如圖 5 所示，香港民眾回答這三個問題的平均值，依序為支持「一國兩制」2.41 分（稍微傾向不支持），政府評價 2.26 分（稍微傾向不好）、民主政治評價 2.30 分（稍微傾向不好），其相關係數也比台灣民眾為高。台灣民眾回答

表 2：主要變項的敘述統計：台灣

	樣本數	平均值	變異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往來中國內地次數	1243	0.261	0.867	0	7
月所得 (新台幣對數)	1143	10.295	0.870	8.517	12.231
自認台灣人或中國人	1243	2.650	0.729	0	3
支持統一	1243	1.841	0.914	1	4
有助家庭經濟	1209	3.010	1.031	1	5
貧富差距	1190	4.097	1.148	1	5
對台灣政府評價	1225	1.971	0.935	1	4
對台灣民主政治評價	1228	2.563	1.002	1	4
非勞動人口	1243	0.319	0.466	0	1
非技術工人	1243	0.286	0.452	0	1
新中產階級	1243	0.239	0.427	0	1
自營業者	1243	0.082	0.275	0	1
資本家或雇主	1243	0.073	0.261	0	1
台灣人	1243	0.860	0.347	0	1
外省人	1243	0.140	0.347	0	1
年齡	1240	46.898	13.633	19	89
教育年限	1239	13.100	3.618	0	18
女性	1243	0.484	0.500	0	1
已婚	1243	0.679	0.467	0	1

這三個問題的平均值，則依序為支持統一 1.84 分（較傾向不同意），政府評價 1.97 分（較傾向不好）、民主政治評價 2.56 分（較傾向中立），三題回答的平均值有明顯的差距，相對於民主受限的香港，經歷民主轉型的台灣民眾，對民主政治本身評價相當高，但是對統一與民選政府的表現卻評價甚低。

圖 5：台港民眾的政治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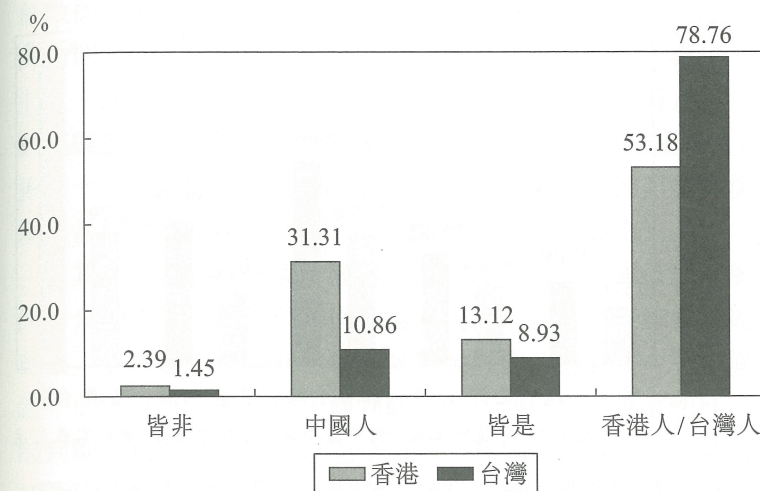


主要的解釋變項

為了驗證前述的三組假設，我們的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包括三個主要部分，第一組假設是族群或身分認同對國家認同和對政府評價的影響。在族群變項方面，為方便台港比較，台灣的數據我們僅區分了本省族群與外省族群，香港相對應的是香港出生者與內地出生者兩個群體（王家英、尹寶珊，2008）。

依據我們的假設，族群通常會透過身分認同與對兩岸（香港與內地）關係的看法，影響對中國政策與現任政府的政治評價，我們引進的第一個測量國家認同的中介變項是身分認同，受訪者自認為是台灣人或中國人，香港對應的題目是受訪者自認為是香港人或中國人，其評分為中國人 = 1，兩者皆是 = 2，台灣（香港）人 = 3，也就是本土認同愈強，分數愈高。圖 6 顯示台港兩地在身分認同上的回應比例，在台灣，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攀升到近八成，自認為是中國人或兩者皆是者，各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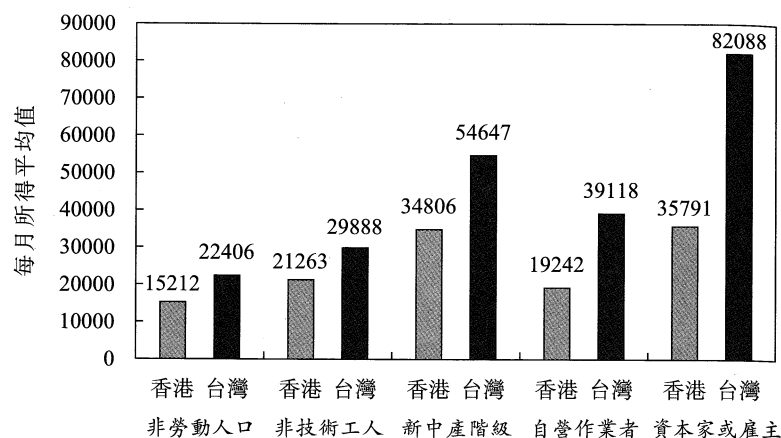
圖 6：台港民眾的身分認同



大約一成；在香港，身分認同則呈現兩極化的趨勢，有超過三成民眾自認為是中國人，但也有近五成半民眾自認為是香港人。

第二組假設是經濟利益與階級身分的影響。在階級身分方面，我們使用以下變項來進行分類，以「請問您目前有沒有工作？」區分出非勞動人口；以「請問您目前的工作是自己當老闆，還是受雇於人？」來區分雇主、自營業者與受雇者；最後以職業的國際職業標準分類（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ISCO）來區分出受雇者當中的新中產階級（Wright, 1985, 1997;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在台灣，四大類階級位置的比例分別是：資本家或雇主 7.3%、自營業者 8.2%、新中產階級 23.9% 與非技術工人 28.6%，相當符合先前類似研究的社會階層比例（林宗弘，2013）。在香港，四大類階級位置的比例分別是：資本家或雇主 4.9%、自營業者 6.1%、新中產階級 25% 與非技術工人 19%，也相對符合我們對香港社會階層以大財團與新中產階級為主的印象。

圖 7：台港民眾各階級的每月所得平均值，2013



注：月所得以該地貨幣單位（港幣／新台幣）計算；香港為全家月所得，台灣為個人月所得。

圖 7 顯示台港不同階級的月所得平均值，台灣的數據較高只是台幣匯率所造成的假象，但是各階級之間的所得分布，還是相當符合我們的預期，台港兩地都是資本家或雇主所得最高，新中產階級所得明顯較高，自營業者與非技術工人的所得偏低，顯示這個簡化的階級分類，仍有相當不錯的信度與效度。然而，由於階級並不能完全解釋所得高低，在本文中，每月所得對數也經常作為階級或社會階層的測量之一。¹

另一個重要的客觀經濟變項，是人員的跨境（界）移動次數，其基本假設是受訪者去中國內地（工作）次數愈多，與中國經濟利益的社會聯繫就愈深，因此可能影響其身分認同與主觀經濟利益。我們所使用的問題是：「從去年 1 月到 12 月底，

請問您有沒有去過中國大陸（內地），去過幾次？」當然，這個數據的平均值在香港（2.9）遠高於台灣（0.26），受限於台灣的問題最高僅到達七次，我們只能將香港的更高次數也算為七次。此外，我們也要求受訪者主觀評估「請問中國大陸市場對您與您配偶目前的工作來講重不重要？」回答為很重要 = 4、重要 = 3、不重要 = 2、很不重要 = 1，台港民眾的回答同樣出現相當程度的差異，台灣平均值為 1.9，香港則為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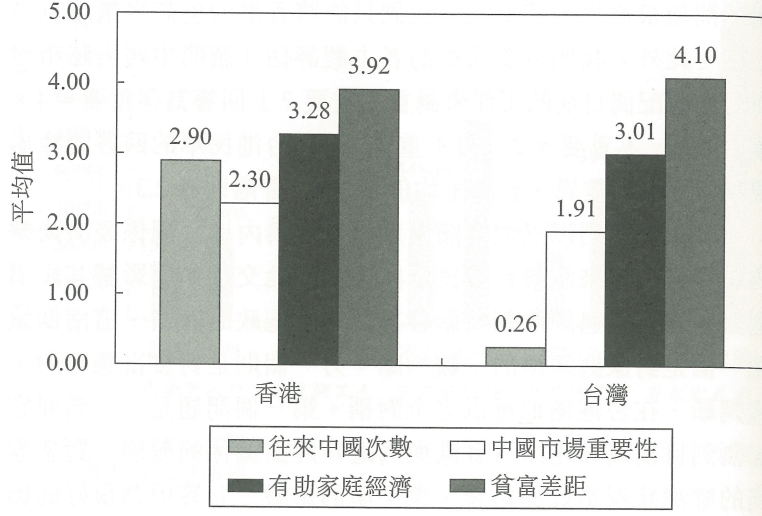
其次，我們以三個有關兩岸（香港與內地）關係經濟衝擊的中介變項，來測量台港民眾與中國內地交往如何影響其經濟利益，並且透過經濟利益影響其對政府施政的評價，這兩個議題一個是對家庭經濟的主觀判斷，另一個則是對貧富懸殊的主觀判斷，在台港兩地可以完全對稱。第一個問題是：「請問您認為到目前為止兩岸（香港與內地）經濟關係的發展，對您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好的影響，還是壞的影響？」答項為很好的影響 = 5、好的影響 = 4、沒有影響 = 3、壞的影響 = 2、很壞的影響 = 1，台灣平均值為 3，香港則為 3.3，顯示台灣民眾的主觀感受是沒有影響，香港民眾略為偏向有好的影響。

第二個有關兩岸（香港與內地）關係經濟衝擊的中介變項是：「請問您認為兩岸（香港與內地）經濟關係的發展愈來愈密切，這樣會擴大或是縮小台灣（香港）的貧富差距？」答項為擴大很多 = 5、擴大一些 = 4、沒有影響 = 3、縮小一些 = 2、縮小很多 = 1，台灣平均值為 4.1，香港則為 3.9，顯示台港兩地民眾主觀感受都是貧富差距惡化。圖 8 將台港民眾回答往來中國內地次數、中國市場重要性、對家庭經濟的影響與主觀貧富差距放在一起，我們可以發現，除了香港民眾往來中國內地次數較多之外，台港民眾對與中國內地經濟整合所造成的經濟與社會衝擊，其主觀認知其實相當貼近。

本文的第三組假設政治轉型命題，依賴台灣與香港的比較來驗證，因此並不需要另行設置特定的自變項。此外，本文也引進一些基本的控制變項，包括年齡、教育程度、性別與婚姻

1. 月所得對數是以該地貨幣單位（港幣／新台幣）取對數計算。

圖 8：台港民眾往來中國內地次數、中國市場重要性、有助家庭經濟、貧富差距的平均值



狀況，香港與台灣數據中，上述各變項之間的簡單相關係數與顯著程度，請參考表 3 與表 4，從這兩張表也可以看出台港之間變項關係的相似性。

台港的移民經驗與經濟分配

在本文的第二組假設中，我們曾提到香港階級與移民關係的特殊性，使得香港不同階級之間對香港與內地關係，以及政府評價的偏好與一般理論不同。假設 2C 認為香港的中下階級與中國內地出生的新移民身分重疊，反而更支持「一國兩制」與現任的親中政府。要證實這個看法，我們必須先證實香港新移民的階級偏向。

表 5 呈現的是香港（模型 1A）與台灣（模型 1B）兩地以階級為依變項——除了「非勞動人口」為對照組之外的非技術工人、新中產階級、自營作業者，以及與資本家或雇主四類階級

表 3：主要變數之間的簡單相關係數與顯著程度：香港

	往來內地次數	月所得對數	自認香港人	一國兩制	有助家庭經濟	貧富差距	對政府評價	對民主評價
月所得(對數)	.1357*							
自認香港人或中國人	-.1392*	.0551						
支持「一國兩制」	.1276*	-.0166	-.2963*					
有助家庭經濟	.0732*	.1461*	-.0957*	.2251*				
貧富差距	-.0684*	-.0054	.1696*	-.2559*	-.1713*			
對香港政府評價	.1493*	-.0804*	-.2816*	.5541*	.2935*	-.2567*		
對香港民主政治評價	.0110	-.0946*	-.0995*	.3783*	.1117*	-.1116*	.3314*	
非勞動人口	-.1509*	-.3379*	.0050	-.0119	-.0408	-.0060	.0532	.0147
非技術工人	.0228	-.0744*	.0275	.1105*	-.0184	-.0588	.0297	.0462
新中產階級	.0563	.3403*	.0074	-.0796	.0616	.0097	-.0409	-.0232
自營作業者	.0264	.0018	-.0717*	.0320	-.0246	.0604	-.0181	-.0008
資本家或雇主	.1651*	.1767*	.0030	-.0540	.0304	.0348	-.0698*	-.0681*
香港出生	-.1506*	.2109*	.2905*	-.1466*	.0599	.1056*	-.1601*	-.1191*
內地出生	.1506*	-.2109*	-.2905*	.1466*	-.0599	-.1056*	.1601*	.1191*
年齡	.0997*	-.1030*	-.1891*	.0839*	-.0924*	-.1580*	.0848*	.0512
教育年限	.0291	.4382*	.1260*	-.1894*	.1470*	.1088*	-.1634*	-.1579*
女性	-.1401*	-.0166	.0620*	.0697	.0235	.0182	.0464	.0371
已婚	.1752*	.1680*	-.1501*	.0742	-.0045	-.0818*	.0418	-.0569

* p < .05

表 4：主要變數之間的簡單相關係數與顯著程度：台灣

	往來內地次數	月所得對數	自認台灣人	支持統一	有助家庭經濟	貧富差距	對政府評價	對民主評價
月所得 (對數)	.2027*							
自認台灣人或中國人	-.1077*	-.0580						
支持統一	.0656*	.0258	-.2575*					
有助家庭經濟	.1098*	.1141*	-.1550*	.1988*				
貧富差距	-.0446	-.0065	.1240*	-.1069*	-.2782*			
對台灣政府評價	.0372	.0061	-.1716*	.1909*	.3697*	-.2676*		
對台灣民主政治評價	-.0347	.0969*	.0188	-.0239	.2030*	-.0637*	.3044*	
非勞動人口	.0070	-.3722*	-.0522	.0722*	-.0204	-.0478	.0790*	-.0441
非技術工人	-.0981*	-.0890*	.0673*	-.0570*	-.0487	-.0125	-.0461	-.0345
新中產階級	.0753*	.3381*	-.0390	-.0365	.1028*	.0242	.0172	.0795*
自營作業者	-.0595*	-.0181	.0390	.0265	-.0326	.0122	-.0445	-.0424
資本家或雇主	.0972*	.2580*	-.0007	.0017	-.0152	.0538	-.0413	.0521
台灣人	-.0392	-.0569	.2198*	-.1084*	-.1520*	.1170*	-.1620*	-.0319
外省人	.0392	.0569	-.2198*	.1084*	.1520*	-.1170*	.1620*	.0319
年齡	.0835*	-.0491	-.1179*	.1369*	-.0947*	.0046	.0278	-.0682*
教育年限	.0773*	.3997*	-.0188	-.0894*	.1815*	-.0380	.0841*	.1579*
女性	-.0681*	-.1668*	.0029	-.0709*	.0549	-.0193	.0995*	.0495
已婚	.0438	.2067*	.0032	.0574*	-.0500	.0849*	-.0079	.0082

* $p < .05$

表 5：台港階級結構與族群身分的關聯

	模型 1A 香港				模型 1B 台灣			
	非技術工人	新中產階級	自營作業者	資本家或雇主	非技術工人	新中產階級	自營作業者	資本家或雇主
年齡	-.0389*** (.0069)	-.0201** (.0066)	-.0069 (.0105)	-.0082 (.0125)	-.0773*** (.0076)	-.0524*** (.0080)	-.0245* (.0102)	-.0304*** (.0109)
教育年限	-.0826** (.0306)	.3462*** (.0351)	.0429 (.0457)	.2497*** (.0571)	-.0622* (.0254)	.3949*** (.0382)	-.0536 (.0338)	.0347 (.0387)
女性	-.7001*** (.1813)	-.5533** (.1791)	-.11737*** (.2920)	-.11222*** (.3330)	-.6425*** (.1607)	-.9894*** (.1796)	-.11321*** (.2368)	-1.4969*** (.2640)
已婚	1.0659*** (.2386)	1.1100*** (.2282)	1.1827** (.3877)	1.9560*** (.4961)	-.0131 (.1727)	.6794** (.2076)	.1638 (.2541)	.8688** (.3118)
內地出生 / 外省族群	-.1731 (.1937)	-.6466** (.2117)	-.3330 (.3082)	-.4624 (.3652)	-.2576 (.2345)	-.0926 (.2346)	-.3827 (.3696)	-.2518 (.3625)
常數	1.7866** (.6255)	-3.9153*** (.6680)	-1.9616* (.9653)	-5.3169*** (1.1928)	4.9803*** (.6202)	-3.2890*** (.7587)	1.4014 (.8569)	-.0832 (.9207)
樣本數	996				1237			
Pseudo R ²	0.1229				0.1325			
Log likelihood	-1172.9005				-1568.0909			

* $p < .05$ ** $p < .01$ *** $p < .001$

位置——的多項分類邏輯迴歸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估計。統計結果顯示，在台港兩地，教育都是影響階級流動的重要因素，在台灣，教育年限主要影響進入新中產階級的勝算比，在香港，教育年限甚至提高了成為資本家的機率——很可能是因為富二代能藉由出國取得更高學歷的緣故。其次，台港兩地年輕世代剛進入職場底層，或可能面對創業困難，因此非技術工人與新中產階級這兩類受雇者的年齡都較輕。

然而，最有趣的對比在於族群或移民身分對階級位置的影響。在台灣，過去研究指出，外省族群雖較可能進入新中產階級位置，而較不可能成為資本家，但是在2013年的統計數據中，不同族群之間的階級差異已不顯著；相反地，在香港的內地出生者特別不容易成為新中產階級，也就是相對集中在非技術工人與自營作業者，以及非勞動人口（在學、在家或退休的依賴者）等所得較低的階級位置或職業類別。

表5證實了香港樣本裏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無法成為新中產階級的現實情況，這種出生地與階級身分重合的情況，可能導致香港認同的特殊結構，使得香港中下階級更加支持「一國兩制」與親中政權，稍後的統計結果將檢證這個假設。

此外，表6也先檢驗幾個影響客觀經濟與人員流動指標的因素，以及族群或出生地對台港兩地民眾身分認同的影響力。本文在分析台港與中國內地關係的利益分配時，假設資本家或雇主與新中產階級屬於跨境（界）流動性高、因跨境（界）流動而獲益較多的階級，這個假設是否成立呢？表6的模型2A和2B，各是香港和台灣民眾往來中國內地次數的線性迴歸模型，迴歸係數顯示，在台港民眾中，往來中國內地次數較多的階級，依序都是資本家或雇主、新中產階級、非技術工人、自營作業者，而作為對照組的非勞動人口，往來中國內地的次數偏低。然而，在台灣，只有資本家或雇主的虛擬變項迴歸係數達到統計顯著水平，香港則是只有自營作業者虛擬變項的迴歸係數未達統計顯著水平。其次，台灣的高教育程度者與年長者

也較常往來中國內地，而香港則是內地出生、已婚者與男性較常往來中國內地。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身分與跨境（界）次數確實影響了台灣民眾的所得。表6針對月所得對數的線性迴歸模型估計結果顯示，台港兩地所得高低的階級次序都相同，由高至低依序為資本家或雇主、新中產階級、自營作業者、非技術工人，教育年限較高與已婚者所得也顯著較高。

其次，往來中國內地次數愈多者所得愈高，在台灣一方的模型結果尤其明顯。香港的模型3A顯示了一些特殊性質，包括出生在內地、較年長的香港民眾所得明顯偏低，而女性所得高於男性（對香港女性地位變化的評估見盧家詠、張妙清、葉漢明，2012），台灣模型3B中，外省族群無所得優勢，較年輕者和女性所得則明顯偏低。如果我們假設香港與內地或兩岸經貿整合，將會提高往來中國內地的跨境（界）次數，而跨境（界）次數又有明顯的階級與教育程度差異，也就間接證實了香港與內地或兩岸經貿整合，使階級的所得不平等惡化。

最後，表6最右邊一欄我們使用了主觀身分認同，來測量族群的影響力。線性迴歸模型4A（香港）與4B（台灣）的估計結果顯示，香港民眾在內地出生者與台灣民眾的外省族群類似，較認同中國人而非香港人或台灣人；台港民眾年齡較大者，更傾向中國認同而非本土認同；香港的男性和自營作業者也偏向自認為是中國人；而台港兩地民眾往來中國內地次數愈多者，代表與中國內地社會經濟關係較為密切，本土認同也愈弱。

統計結果

接下來各個模型將依據檢證文獻回顧中的三個命題。首先，依據族群政治與身分認同命題，我們預期台灣民眾中的外省族群更傾向自認為是中國人，較支持兩岸統一、對現任親中政府與民主政治的評價也偏高；反之，本省族群更傾向自認為是台灣人，較不支持兩岸統一，對現任親中政府與民主政治的評價

表 6：台港民眾社經背景與往來中國內地次數、月所得、身分認同的關聯

	往來內地次數		月所得(對數)		自認是香港人或台灣人	
	模型 2A 香港	模型 2B 台灣	模型 3A 香港	模型 3B 台灣	模型 4A 香港	模型 4B 台灣
階級(非勞動人口)						
非技術工人	.5322* (.2299)	-.0838 (.0665)	.1700** (.0580)	.4725*** (.0556)	.0330 (.0802)	.0367 (.0551)
新中產階級	.7116** (.2250)	.0834 (.0725)	.3775*** (.0568)	.7768*** (.0608)	-.1498 (.0786)	-.0401 (.0600)
自營業者	.4773 (.3583)	-.1798 (.0960)	.2813** (.0973)	.4898*** (.0793)	-.2505* (.1247)	.0970 (.0795)
資本家或雇主	2.1299*** (.4013)	.2623* (.1018)	.5631*** (.1035)	1.1406*** (.0849)	.0118 (.1415)	.0269 (.0844)
族群(香港出生/本省族群)						
內地出生/外省族群	.9545*** (.1847)	.0438 (.0710)	-.2102*** (.0486)	.0065 (.0582)	-.5444*** (.0651)	-.4279*** (.0587)
年齡	.0081 (.0060)	.0082*** (.0022)	-.0041** (.0016)	.0099*** (.0019)	-.0053* (.0021)	-.0074*** (.0019)
教育年限	.0333 (.0280)	.0263** (.0082)	.0714*** (.0075)	.0873*** (.0068)	.0149 (.0097)	-.0063 (.0068)
女性	-.5613*** (.1691)	-.0883 (.0501)	.1348** (.0433)	-.1165** (.0413)	.1197* (.0591)	-.0037 (.0415)
已婚	.6304** (.2030)	-.0031 (.0550)	.3968*** (.0542)	.2991*** (.0450)	-.0703 (.0709)	.0799 (.0455)
往來內地次數						
常數項	1.3050* (.5276)	-.4267* (.1871)	.0179* (.0083)	.1153*** (.0237)	-.0265* (.0111)	-.0697** (.0236)
樣本數	996	1237	775	1138	996	1237
R ²	.1030	.0416	.3469	.4037	.1277	.0745
Adjusted R ²	.0948	.0346	.3383	.3984	.1188	.0670

* $p < .05$ ** $p < .01$ *** $p < .001$

也偏低。香港民眾出生於內地者更傾向自認為是中國人，較支持「一國兩制」，對現任親中政府與民主政治的評價也偏高；反之，香港出生者更傾向自認為是香港人，較不支持「一國兩制」，對現任親中政府與民主政治的評價也偏低。

其次，經濟利益與階級分配命題認為，台灣民眾裏，中下階級更傾向貿易保護主義，從兩岸經濟整合中獲益偏低，對兩岸經貿往來造成貧富懸殊更敏感，因此對現任親中政府與民主政治的評價偏低。然而在香港，我們檢證了與一般理論對立的新移民假設：由於香港的中下階級與中國內地出生的新移民身分重疊，低技術工人階級更依賴與中國內地經濟整合，因此工人階級與資方或中產階級相比，更支持現任的親中政府與「一國兩制」。

表 7 顯示了台港民眾對兩個中介變項——主觀評估家庭經濟損益與貧富差距的看法。在家庭經濟是否獲益方面，模型 5A（香港）估計結果顯示，香港的高教育程度者、經常往來中國內地者，傾向認為香港與內地經濟整合有利其家庭經濟；模型 5B（台灣）估計結果顯示，台灣的外省族群、高教育程度者、往來中國內地次數較多者，傾向認為兩岸經貿有利其家庭經濟，上述主觀評估的統計結果與客觀所得分布有關。

儘管對往來中國內地次數與所得分配的分析顯示，客觀上香港內地與兩岸經貿往來已使階級不平等惡化，仍有其他因素影響民眾對貧富差距的主觀評估。模型 6A（香港）的估計結果顯示，香港的內地出生者與年齡較大者，顯著傾向認為貧富差距擴大不嚴重；模型 6B（台灣）的估計結果顯示，台灣的外省族群、未婚者，和往來中國內地次數較多者，傾向認為貧富差距擴大不嚴重。整體而言，台港兩地的統計結果，仍部分支持一般開放貿易政治理論——高教育程度與經常往來中國內地者，較傾向認為自己從開放貿易中獲益，但族群因素也會影響台港民眾對經濟利益的主觀評估。

表 8 呈現了本文最終的三個依變項——對「一國兩制」或兩

表 7：台港民眾社經背景、往來中國內地次數與對中國內地經濟整合看法的關聯

	有助家庭經濟		貧富差距	
	模型 5A	模型 5B	模型 6A	模型 6B
	香港	台灣	香港	台灣
階級 (非勞動人口)				
非技術工人	-.0233 (.0890)	-.0804 (.0790)	-.1632 (.0994)	.0524 (.0899)
新中產階級	-.0143 (.0876)	.0574 (.0855)	-.0959 (.0957)	.1760 (.0985)
自營作業者	-.0816 (.1396)	.0100 (.1161)	.2899 (.1570)	.0708 (.1308)
資本家或雇主	.0134 (.1530)	-.0349 (.1226)	.1876 (.1737)	.2686 (.1373)
族群 (香港出生 / 本省族群)				
內地出生 / 外省族群	-.0889 (.0726)	.3890*** (.0846)	-.1864* (.0811)	-.3750*** (.0971)
年齡	-.0034 (.0023)	-.0029 (.0027)	-.0090*** (.0026)	-.0023 (.0031)
教育年限	.0320** (.0109)	.0366*** (.0098)	.0141 (.0123)	-.0150 (.0112)
女性	.0914 (.0654)	.1149 (.0594)	.0523 (.0729)	-.0216 (.0681)
已婚	.0697 (.0793)	-.1082 (.0651)	.0386 (.0888)	.2248** (.0750)
往來內地次數	.0320** (.0124)	.1196*** (.0335)	-.0194 (.0138)	-.0635 (.0385)
常數	2.8808*** (.2029)	2.6023*** (.2222)	4.2304*** (.2283)	4.2456*** (.2541)
樣本數	901	1204	920	1186
R ²	.0343	.0680	.0473	.0304
Adjusted R ²	.0235	.0602	.0368	.0221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 8：台港民眾社經背景、身分認同與政治評價的關聯

	一國兩制 / 支持統一		對政府評價		對民主政治評價	
	模型 7A 香港	模型 7B 台灣	模型 8A 香港	模型 8B 台灣	模型 9A 香港	模型 9B 台灣
階級(非勞動人口)						
非技術工人	.0668 (.0689)	-.0659 (.0692)	-.0091 (.0675)	-.0966 (.0685)	.0824 (.0710)	-.0012 (.0777)
新中產階級	-.0309 (.0671)	-.1085 (.0755)	-.0267 (.0659)	-.1216 (.0746)	.1130 (.0692)	.0861 (.0845)
自營作業者	.1209 (.1099)	.0309 (.1024)	-.0856 (.1054)	-.1029 (.1008)	.0762 (.1149)	-.0254 (.1156)
資本家或雇主	-.1228 (.1171)	-.0876 (.1070)	-.2833* (.1129)	-.1053 (.1053)	-.0799 (.1185)	.3308** (.1198)
族群(香港出生 / 本省族群)						
內地出生 / 外省族群	.0194 (.0592)	.0902 (.0771)	.0412 (.0588)	.1977** (.0762)	.1220* (.0611)	-.0187 (.0862)
年齡	-.0022 (.0018)	.0024 (.0024)	.0005 (.0017)	.0040 (.0024)	.0017 (.0019)	.0024 (.0027)
教育年限	-.0289*** (.0086)	-.0227** (.0087)	-.0218* (.0086)	.0135 (.0087)	-.0320*** (.0091)	.0394*** (.0098)
女性	.1302* (.0506)	-.1500** (.0524)	.0731 (.0493)	.0951 (.0518)	.0182 (.0522)	.0589 (.0587)
已婚	.0438 (.0624)	.1207* (.0577)	-.0510 (.0603)	.0133 (.0570)	-.1912** (.0642)	.0398 (.0647)
往來中國次數	.0197* (.0097)	.0087 (.0296)	.0270** (.0095)	-.0233 (.0291)	-.0023 (.0100)	-.0928** (.0331)
自認是香港人或台灣人	-.1832*** (.0284)	-.2759*** (.0367)	-.1524*** (.0279)	-.1194** (.0364)	-.0382 (.0291)	.0680 (.0413)
有助家庭經濟	.1671*** (.0263)	.1670*** (.0263)	.1838*** (.0255)	.2717*** (.0260)	.0868** (.0271)	.1850*** (.0295)
貧富差距	-.1367*** (.0236)	-.0283 (.0232)	-.1119*** (.0230)	-.1256*** (.0229)	-.0525* (.0247)	-.0296 (.0261)
常數	3.0799*** (.2196)	2.3823*** (.2623)	2.6276*** (.2095)	1.6211*** (.2600)	2.6699*** (.2276)	1.2598*** (.2953)
樣本數	820	1161	739	1148	768	1153
R ²	.2112	.1296	.2156	.1925	.0701	.0781
Adjusted R ²	.1985	.1198	.2015	.1833	.0541	.0675

* p < .05 ** p < .01 *** p < .001

岸統一的支持程度、對台港現任親中政府的評價、對民主政治評價的線性迴歸統計結果。模型 7A（香港）與 7B（台灣）的估計結果顯示，香港民眾中，教育程度愈高、本土認同愈強者，愈不支持「一國兩制」；女性和往來中國內地次數愈多者，則較支持「一國兩制」；但是控制上述因素之後，在內地出生者對「一國兩制」卻沒有明顯的偏好。台灣民眾中，也是本土認同愈強者，愈反對兩岸統一；女性、未婚與高教育程度者，也較反對兩岸統一；但是控制上述因素之後，族群對支持統一影響不大。此外，認為與中國內地經貿往來有助於自己家庭經濟者，也較支持「一國兩制」或兩岸統一；認為貧富懸殊因與中國內地貿易而惡化者，則更反對「一國兩制」，對台灣受訪者是否支持兩岸統一則未有顯著影響。總之，以上台港對照的兩組統計模型結果，大致可以檢證主觀身分認同（中介了大部分的族群與出生地效果），及與中國內地的社會經濟關係的主觀認知（中介了大部分的階級效果），塑造兩地民眾國家認同之偏好；另一方面，性別與教育也會對國家認同產生一些影響。

其次，在對現任親中政府的評價方面，模型 8A（香港）的估計結果顯示，資本家或雇主、教育程度較高、自認為是香港人、主觀認為貧富差距惡化者，對政府評價明顯較低；而經常往來中國內地、認為自己家庭從香港內地經濟往來中獲益者，則對政府評價較高。模型 8B（台灣）的估計結果顯示，台灣的外省族群、年齡較高者，還有本土認同較弱、傾向認為兩岸經貿有利其家庭經濟的民眾，對政府評價較高；自認為是台灣人，及認為兩岸經貿導致貧富差距惡化者，則是不滿現任政府的主要因素。

對民主政治的評價方面，模型 9A（香港）的估計結果顯示，香港民眾中，出生於內地、認為自己家庭經濟從與內地經貿往來獲益者，對香港的民主發展現狀較為滿意；反之，教育程度較高、已婚，及認為與內地經貿往來導致貧富懸殊者，對香港民主發展現狀較不滿意；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模型裏，出生

地的效應大於主觀身分認同。模型 9B（台灣）的估計結果顯示，台灣的資本家或雇主、高教育程度者、認為兩岸經貿有利其家庭經濟的民眾，對台灣民主政治的評價較高；往來中國內地次數愈多者，則對台灣民主政治的評價較低；其他的政治、經濟或社會因素，對此則沒甚麼影響。此處值得一提的是，平均而言，台灣民眾對民主政治的評價，遠高於香港民眾的評價，而且主觀本土認同或族群身分，對民主政治的評價已沒有顯著影響。

討論與結論

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台灣與香港社會的民意？或者，其實在公民「革命」前夕，由於中國效應的衝擊，台港民意早已背棄了執政者？本文的文獻回顧中提出了三個影響台港民眾對政府評價的一般理論命題。首先是族群政治與身分認同命題，出生地或族群背景影響民眾的主觀身分認同，並透過主觀身分認同，影響其對中國政策與對現任親中政府的評價。其次是經濟利益與階級分配命題，亦即階級位置，以及與中國相關的經濟利益，影響民眾對開放貿易的評價，從而影響其對中國政策與現任親中政府的評價。第三是政治轉型命題，亦即政治體制是否已完成民主轉型，影響民眾身分認同本土化的程度與其對民主的評價。2013年由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合作的「中國效應調查」，提供了一次寶貴的機會，讓我們可以在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爆發之前，驗證或否認上述的理論假設。

對台港兩地數據的分析，大致符合三個假說，尤其是族群背景與身分認同所造成的影響——台灣的外省族群，與在中國內地出生的香港民眾，都有較弱的本土認同或較強的中國認同，也較支持兩岸統一或「一國兩制」；反之，本省族群與香港出生者，則對抱持親中政策的政府較為不滿，呈現了兩地中國效應引發認同政治衝突的共通性。

然而，香港特殊的階級與族群交互作用，使其各社會階級民眾主觀認定的經濟利益（假設 2C）與台灣大不相同。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台灣所得偏低的非技術工人與自營業者較反對統一、對兩岸經濟整合所造成的貧富差距等問題較為敏感（林宗弘、胡克威，2011），本文則發現所得高而且可能從兩岸經貿獲益的資本家，在馬英九總統任內對民主的評價較高。反之，香港底層階級較多是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可能因此中和了階級利益假說，反而是資本家對現任政府的評價感到失望。

上述的統計結果雖然只能呈現橫斷面社會、經濟與政治的中國效應，卻仍可促進我們對造成現狀之歷史發展的理解。如前所述，台灣民眾的本土認同，已從 1990 年代初期多數是中國人或雙重認同，到 2008 年後多數自我認同是台灣人，而且 1949 年後的第一代移民正在凋零；香港也在北京干預香港政治，與內地新移民造成香港出生群體的認同危機下，自 2010 年來出現香港認同大幅上升的現象，但若族群政治與身分認同命題為真，則本土認同提升將會衝擊台港民眾對現任親中政府的評價。

另一方面，經濟利益與階級分配命題指出，跨境（界）流動的資方與中產階級，將從香港內地經濟整合或兩岸經貿擴張中獲益，這也是他們支持現任政府以及親中政策的主要原因；然而另一方面，客觀上中國效應造成的貧富差距惡化，卻可能使得未能從與中國內地的經濟關係中獲益者，擔心本地遭受到負面的社會衝擊，在台灣，擔心貧富差距惡化的效應，是民眾對政府評價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我們比較台港兩地的差異時，會發現族群或身分認同因素，對台灣民眾如何評價民主體制，並沒有明顯的影響，顯示台灣在民主轉型之後，激化的族群政治可能已漸漸消退，也可能顯示中國內地新移民數量較少，而尚未激化新的族群衝突；反觀香港卻陷入種種政治與社會矛盾，一方面民主化遲遲未能完成，另一方面落入社會底層的內地新移民與本土認同者對立

激化，使得族群政治與身分認同衝突對政府評價或民主現狀之評價的影響，變得更顯著，值得進一步的關注與研究。

參考書目

-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 王甫昌。2008。「族群政治議題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的角色」，《臺灣民主季刊》，第 5 卷，第 2 期，頁 89-140。
- 王卓祺、尹寶珊。2012。「對貧富差距的觀感與政策取向」，載王卓祺、尹寶珊、羅智健編，《從社經指標看香港社會變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頁 153-98。
- 王家英、尹寶珊。2008。《從民意看香港的社會與政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王靖興、孫天龍。2005。「臺灣民眾民主政治評價影響因素之分析」，《臺灣民主季刊》，第 2 卷，第 3 期，頁 55-79。
- 台灣指標民調。2015。「馬總統滿意度及信任度趨勢」（http://www.tisr.com.tw/wp-content/uploads/2015/05/20150528_G4.png）。
- 吳乃德。1997。「檳榔和拖鞋，西裝及皮鞋：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原因」，《台灣社會學研究》，第 1 期，頁 137-67。
- 吳乃德。1999。「家庭社會化和意識型態：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世代差異」，《台灣社會學研究》，第 3 期，頁 53-85。
- 吳乃德。2005。「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刊》，第 9 卷，第 2 期，頁 5-39。
- 吳乃德。2013。「狂飆的年代？一般民眾的認同趨勢，1992-2005」，載張茂桂、羅文輝、徐火炎編，《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傳播與政治行為》。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頁 93-128。
- 呂大樂、王志錚。2003。《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林宗弘。2009。「台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1992-2007」，《臺灣社會學刊》，第 43 期，頁 93-158。
- 林宗弘。2013。「ECFA 之後的中國效應：兩岸貿易對台灣貧富差

- 距與階級政治的影響」，載楊文山、尹寶珊編，《面對挑戰：台灣與香港之比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頁 287-325。
- 林宗弘。2014。「台灣的民主轉型與世代政治：1995-2010」，載趙永佳、蕭新煌、尹寶珊編，《一衣帶水：台港社會議題縱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頁 171-214。
- 林宗弘、胡克威。2011。「愛恨 ECFA：兩岸貿易與臺灣的階級政治」，《思與言》，第 49 卷，第 3 期，頁 95-134。
-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15。「臺灣民眾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 年 06 月-2015 年 06 月）」（<http://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6>）。
- 胡克威、林宗弘、黃善國。2010。「階級政治的復興？台灣的民主轉型與階級投票，1992-2004」，發表於 2010 臺灣社會學會年會，輔仁大學，12 月 4-5 日，台北。
-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2014。「身分類別認同（半年結）：（7-12/1997 — 7-12/2014）」（http://a2014.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halfyr/eid_half_chart.html）。
-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2015。「彭定康、董建華、曾蔭權及梁振英評分比較（按月計算）」（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ce2012/cy/cecomparison/donald_comparison_chart.html）。
- 耿曙、劉嘉薇、陳陸輝。2009。「打破維持現狀的迷思：台灣民眾統獨抉擇中理念與務實的兩難」，《台灣政治學刊》，第 13 卷，第 2 期，頁 3-56。
- 馬嶽。2012。「政制改革的民意分析」，載王卓祺、尹寶珊、羅智健編，《從社經指標看香港社會變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頁 199-218。
- 張佑宗。2011。「選舉結果、政治學習與民主支持：兩次政黨輪替後台灣公民在民主態度與價值的變遷」，《臺灣民主季刊》，第 8 卷，第 2 期，頁 99-137。
- 張茂桂等。1993。《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社。
- 盛杏湏。2002。「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一九九〇年代的分析」，《選舉研究》，第 9 卷，第 1 期，頁 41-80。
- 陳志柔、于德林。2013。「台灣兩岸政策態度的世代差異」，載楊文山、尹寶珊編，《面對挑戰：台灣與香港之比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頁 209-35。
- 陳陸輝。200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第 7 卷，第 2 期，頁 65-84。
- 陳義彥。1996。「不同族群政治文化的世代分析」，《政治學報》，第 27 期，頁 83-121。
- 陳義彥、陳陸輝。2003。「模稜兩可的態度還是不確定的未來：台灣民眾統獨觀的解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第 5 期，頁 1-20。
- 游清鑫、蕭怡靖。2007。「以新選民的政治態度論台灣民主政治的未來」，《臺灣民主季刊》，第 4 卷，第 3 期，頁 109-51。
- 黃子為、葉國豪。2013。「香港與台灣民眾的主觀貧富差距及政治後果：2003 至 2009 年」，載楊文山、尹寶珊編，《面對挑戰：台灣與香港之比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頁 237-66。
- 楊春。2012。「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跨境區域融合及演變」，載王卓祺、尹寶珊、羅智健編，《從社經指標看香港社會變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頁 111-34。
- 遠見民調。2008-2011。「『馬總統執政滿意度』民調」（<http://www.gvsrcc.com/disppageBox/GVSRCCP.aspx?ddsPageID=POLITICS&遠見民調>）。
- 劉義周。1994。「台灣選民政黨形象的世代差異」，《選舉研究》，第 1 卷，第 1 期，頁 53-74。
- 鄭夙芬。2009。「族群、認同與總統選舉投票抉擇」，《選舉研究》，第 16 卷，第 2 期，頁 23-49。
- 盧家詠、張妙清、葉漢明。2012。「女性地位：近 20 年的趨勢」，載王卓祺、尹寶珊、羅智健編，《從社經指標看香港社會變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頁 41-70。
- 蕭新煌、尹寶珊。2014。「評估『中國關係』：比較台灣與香港的民意」，載趙永佳、蕭新煌、尹寶珊編，《一衣帶水：台港社會議題縱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頁 277-320。
- 瞿海源、傅仰止、伊慶春、章英華、張晉芬編。2005。《台灣民眾的社會意向 2004》。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6. *Economic Origins of*

-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Benedict. 2006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tkinson, A. B. 2008.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in OECD Count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rikson, Robert and John H. Goldthorpe.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ellner, Ernest. 2006.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Henders, Susan J. 2010. *Territoriality, Asymmetry, and Autonomy: Catalonia, Corsica, Hong Kong, and Tibe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Hiscox, Michael J. 2002.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obsbawm, E. J. 1992.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nnings, M. Kent. 2007.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Russell J. Dalto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9–44.
- Lake, David A. 2009. "Open Economy Politics: A Critical Review,"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4(3):219–44.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Seymour M. 1981.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Jack Snyder. 2005. *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Moore, Barrington,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 Rigger, Shelley. 2006. "Taiwan's Rising Rationalism: Generations, Politics,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Washington, DC: Policy Studies No. 26, East-West Center.
- Rogowski, Ronald.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ing, Ming. 2004. *Hong Kong's Tortuous Democrat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Sing, Ming. 2010. "Explaining Mass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Hong Kong," *Democratization*, 17(1):175–205.
- Smith, Anthony D. 1987.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Smith, Anthony D. 2008. *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Nations: Hierarchy, Covenant, and Republic*. Malden: Wiley-Blackwell.
- Snyder, Jack. 2000.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Norton.
- Tilly, Charles. 2007.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mmer, Andreas. 2013. *Waves of War: Nationalism, State Formation, and Ethnic Exclu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Erik O. 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
- Wright, Erik O.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ang, David D. 2007. "Classing Ethnicity: Class, Ethnicity, and the Mass Politics of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World Politics*, 59(4):503–38.